



# 王安忆画葛优陈凯歌 他们都是纠结的人

(摘自《今夜星光灿烂》，王安忆著，新星出版社2013年11月)  
缩编 戴维

## 陈凯歌： 他迷上电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

和陈凯歌一起写《风月》，使我有兴趣的倒不是《风月》，而是陈凯歌的工作方式。有时候，与陈凯歌为一个问题争论，争到激烈处，他会说：这是我的东西！我就噎了一下，说不出话来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他说的是对的。也有过一次，他大约是喝了一点酒，心情比较好，说：我要让这个电影充满你的情调。这话使我觉得他至多是要赠送我一个礼物，但也绝不会以为那就是我的东西。我们都是极端自我的人，这决定了这个合作中的大困难，但谁知道呢？也许成功的契机也在这里。工作并不是没有乐趣的，我向陈凯歌学到很多东西。



现在回想那几个月，真有些后怕。陈凯歌干活的方式是有些笨的，还有些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照我看来，有一些情节，是可以事先做预测的。可他不行，他一定要走一遍，撞到南墙上再回头。例如，景云这个人物。他是如意最后一定要嫁的男人。最初的景云是一个俗气的人，曾经安排过这么一场戏，让他在澡堂子里，和拆白党头子一起聊日本，说人家日本是中国的零碎儿，地盘是中国大陆的边角料，文字也是中国字的边角料。你可以想见是个什么面目了。陈凯歌还进一步说：就朝英达那个形象上靠。然而，无论我们让如意对男性失望到什么程度，最终，要与这样一个人结婚，精神上很难说是有什么胜利感的。

直到最后，终于做出一个大决定，就是让景云改变形象，成为一个美少年，事情才开始变得通顺起来。并且这一个形象改变，又反过来促进了如意更上一层楼，她的热情竟是那么春风不灭，野火又生。当陈凯歌决定改变景云的时候，我自然有些埋怨，因我其实是提醒过这个人物的毛病，可他执意要做到底，现在却要变。他说这不是变，而是找，把对的东西找出来。就这么样，那个破景云叫我们蹉跎了时间。

如前面所说，我必须面对现实，这现实就是陈凯歌的东西，我如何去做。第一是必须明白他要的是什么，第二是至少要理性上同情他要的东西，他要的是什么呢？

他是一个贪婪的人。他要的东西太多了。我不知道他让电影承担这样重大的负荷对头不对头，但我预感到，他将是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。

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强的人，经历过的东西不容易淡忘，就像一个扛着大背囊旅行的人，背囊越来越重，却不舍得丢下任何东西，任何东西于他都很珍贵，因为他走过的路途有关。他还要检阅他的收藏。

这些收藏在他的眼睛里不断有着新发现，更新着他的情感和认识。他又是一个积极生活的人，手和脑一样勤快，于是就像一个肯吃苦的农人一样，每一季庄稼都收获得很多。当他向你表述他心里所想时，语言挟裹着思索和激情汹涌

而来，你险些儿站不住脚，被它席卷而去。当他清理他的思想时，你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痛苦和劳累。似乎是，什么都是贴心贴肺，放不下这又放不下那。有时候我甚至觉得，像陈凯歌这样思想和情感太多的人，迷上电影，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。

陈凯歌对如意可说是倾心倾爱，一个中年人去写一段少年爱，其实是有许多凄楚的。这也是少年往事，只不过，这往事不是那往事。我对他一句话记忆犹新，他说：我还有燃料！这年纪，燃料也是千锤百炼的燃料了。在这个年龄段上，爱情其实是个举重若轻的东西，貌似轻巧，内里却是沉重。岁月都不是白过的，不是这里，就是那里，就要留下破绽。倘要抖擞起来，是须加倍的热力与能量。

陈凯歌有时候形容爱情的强烈程度时，会说：那是可以拔出枪向你开枪的。这话是有些蛮不讲理了，可依然骗不过他自己，说完之后还得坐下来，抱头想理由。你想想，这样的爱情道路有多艰难。

到了最后，如意从她亲手缔造，然后亲手销毁的爱情堡垒中走过来，茫茫四野，谁能与她共赴爱的前线？这是在向我们的想象力挑战。陈凯歌说：我真是给我自己找了个对手。面对着这样的对手，是很难不被激动起来的。也因此我非常能理解，后来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如意换角儿风波，陈凯歌是很难找到他的意中人的。

## 葛优： 逼他讲笑话不如让他拌菜心

这一天，先是我们约陈丹青，再是陈丹青约阿城，然后阿城约滕文骥，最后是滕文骥约葛优。因是最后约的，葛优自然就迟到了，于是，他的出场就有了更充足的铺垫。葛优总是给我们喜剧的印象，其实他表演最出色的《霸王别姬》倒是个正剧的角色，可到底禁不住大量涌现的滑稽形象，加上媒介的推波助澜，他不喜剧也得喜剧了。记得上海电视台曾经给葛优做过一个和观众同乐的余兴节目，须回答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，葛优回答得很老实，不怎么出彩，当然观众们也乐了。在这种场合，说老实话难免有点我们上海人说的“讲死话”的意思，而“讲死话”向来被尊为笑话的上乘。说起来，做人也不是自己能做主的，不是有句俗话说叫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吗？像这样的公众人物，都是在风起云涌中做人，是要被推着走的。

所以，葛优还没来，我们已经做好了笑准备，而葛优似乎也自觉着有这样的责任，进门就说了句笑话：“我是这里的三倍。”“这里”指的是他们合伙开的饭店，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大家自然是乐了一番，可接下来便没了下文，只能用我们的笑声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去填补。大家都有些兴奋，期待地看着葛优的嘴，好像那里还会蹦出金豆子来。不承想，葛优甚至是有口无心的，面对我们这些生人还有些腼腆，想不出什么话题。我们只得去问他，贺岁片拍得怎么样，导演如何，本子又如何，像诱供似的，要套出点噱头来。他回答得也很老实，说是有些同事态度不认真，又不动脑筋，一会儿呼机响，一会儿呼机响，工作气氛不太好。我们又问他哪个演员表现如何，哪个演员表现又如何，他都一一回答，有自己的看法却也不损人。谈起电影场上的事，并不抖搂花絮绯闻，倒是乐于说一些郑重的事情。于是，渐渐的，我们也就把葛优搁在了一边，滕文骥则作为替补队员上了场，说了许多趣事趣闻。阿城也有许多要说的，当然是比较严肃的话题，关于文化什么的。再加上我们这些啦啦队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场上也十分热闹。

葛优终于被大家放过，显见得是松了一口气，却又有些意不过，好像辜负了大家的期望，终席之时，便提出要拌个白菜心给我们吃。他从厨房要来嫩白菜心和各种作料，全神贯注地调制起来。他手艺确实不错，显然干这个比逗嘴更擅长也更自然。

这其实是一个实在人，没有一点滑稽腔，不是个可做笑料的角儿。所以被派作“笑星”，大概是因为他有些“逗”的相貌决定，也因我们对喜剧的误解，就像有些老苦着脸的演员，就被派作了悲剧明星。可惜的是演员，钢都没用在刀刃上，尤其是像葛优这样有实力的演员。我说他好，一是从他银幕上的表现看来，二是见了葛优发现他是一个勤于劳动的人，对事情有着老实的态度。有了这两点，事情就差不多了。不知道葛优自己怎么考虑，我倒是为他考虑，他应当出任些什么样的角色。我想，他是可以演日本电影《蒲田进行曲》这样的小人物的戏剧，他还可以走美国演员达斯汀·霍夫曼的道路，比如《毕业生》、《英雄》、《宝贝儿》这一类的故事。他的形象其实是很具有现代感的，是芸芸众生的精英相。再想想，我们本国有哪些角色可以派给他，便想到余华的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倘若有人要将这小说好好地改成电影，葛优是可以出演许三观的。

(下转 D03 版)

